

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郑 震

提要：本文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试图分析和勾勒出空间概念在西方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境遇变迁，并深入探讨当代西方社会学空间转向的思想来源、基本特征和理论意义。这一空间转向将空间概念社会本体论化，它具有借鉴并超越传统的客观环境论和主观空间论，以及反客观主义、反普遍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主导特征。但是其空间视角依然不同程度地为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所困扰，并受制于时间与空间二元化的传统思路，针对于此，本文将展望一种对空间概念的理论重构。

关键词：空间 社会空间 空间转向 空间本体论 西方社会学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列斐伏尔、福柯、吉登斯、哈维、索佳、卡斯特、布迪厄等一批社会理论家的共同推动下，空间问题才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空间概念也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人们广泛地意识到，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乃至社会理论中，一种空间转向已经发生。以下我们将首先对当代空间转向之前的西方社会学的空间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勾勒，并结合我们的论题对外在于社会学领域的现象学的空间思考给予一定的关注，我们将看到，这两条线索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西方社会学乃至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前空间转向的社会学的空间研究

厄里认为“社会学经典确实探讨了空间，但探讨的方式却很不明晰，很不充分”（厄里 2003：510），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社会学家没有能够就空间给出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洞见，只不过这些洞见往往被社会学的后继者们忽视了。

与他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时间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相比，马克思关于空间的讨论显得贫乏得多。“马克思主要将空间视为一个物理的情境，是生产场所的总和，不同市场的领域，被时间和日益自由的资本的运作所‘克服’的一个天然的距离冲

突的来源”(Soja, 1989: 126)。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空间主要呈现为两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内部所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空间体现为劳动时间在生产的物理环境中横向并列和扩张的可能性,“如果从空间方面来看工作日,——从空间方面来看时间本身,——那就是许多工作日同时并存”(马克思, 1995: 378)。另一方面,空间则体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扩张过程中需要加以征服的国家的乃至全球的市场和距离(马克思, 1998: 128)。不可否认的是,与时间问题相比,马克思并没有针对空间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化建构,尽管他的许多论述都隐含着空间的因素(例如,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统治、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工人的集中和革命联合等等),但他并没有就此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空间理论的视角,这使得空间在其思想中既重要却又并不突显,既不可或缺,却又地位模糊,究其根本则是由于马克思主要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环境条件。这也就难怪索佳指出,马克思意识到了空间性在隐藏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所具有的不透明性,间接触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性给出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Soja, 1989: 126 - 127)。应当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并不缺少在当代意义上进行空间化的基本条件,他那些隐含着空间维度的讨论完全可以被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空间视角所激活,并从中发展出一系列超越客观环境论的空间理论。

相比之下,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则要积极得多,他从其社会决定论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空间理论。涂尔干敏锐地意识到了空间划分的社会差异性(涂尔干, 1999: 22),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往往赋予空间以不同的意义。“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很显然,所有这些区别都来源于这个事实: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既然单一文明中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空间,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划分形式及其所依据的情感价值也必然是同样普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们起源于社会”(涂尔干, 1999: 12)。人们并不仅仅活动于一个作为物质环境的空间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而言,空间都已经被注入了人类的集体情感,那些对空间方位的划分并非只是呈现为一些冷冰冰的物理参数,相反它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情感价值。通过对大量人类学资料的研究,涂尔干指出,空间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同质的,空间的形象只不过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

的投射,由此人们才可能在空间中安排具有不同社会意义的事物,就像在时间上来安排各种意识状态一样(涂尔干,1999:12-13)。这一理论对于空间的社会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涂尔干的论述显然过于简洁,并且没有得到作者本人的太多重视和充分发挥——涂尔干显然无意于发展一种研究社会总体的区域化的空间视角,他那偏好寻求一般性的决定论法则的实证主义倾向也在实质上阻碍了此种视角的形成。因此在索佳看来,涂尔干的社会学是相对无空间的,并且将空间维度边缘化为一种几乎是机械的外在性(Soja,1989:144)。涂尔干的确没有完全避免将空间视为物理的外部环境,但他对空间划分的些许讨论使索佳出于论战的需要而做出的批评略显偏激。

与涂尔干不同,齐美尔从心灵与互动的角度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思想。我们可以对齐美尔的空间思想进行一种双重的解读。一方面,他和马克思、韦伯^①,以及一定程度上和涂尔干一样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物质环境,指出一般空间或空间性是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空间性既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不生产社会生活,空间只是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齐美尔,2002:459),是可以被某种社会形态加以填充的空虚和无价值的地域性的空间环境。当然,在有些事件中,空间的形式条件也可能凸显为一种重要的影响事件的力量(齐美尔,2002:460),比如一场战争中的地形条件;而下一盘棋则完全不同,后者尽管也受到空间条件的制约,但是下棋的人却无需针对这个空间条件本身采取什么认知的行动。总之,此种对空间的理解是贫乏和消极的,然而,齐美尔几乎同时还向我们展现了其空间思想的另一种可能,尽管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空间的客观环境论,但是这一别样的可能极富启发性。齐美尔指出:“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齐美尔,2002:460)。齐美尔从与社会决定论视角截然不同的心灵及其互动的角度为我们重构了空间划分的理论,他指出:“康德曾经把空间界定为‘待在一起的可能性’。——这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齐美尔,2002:461)。尽管空间

^① 韦伯不仅将空间理解为机械的外部环境(Soja,1989:144),而且几乎没怎么讨论到空间(厄里,2003:511)。

概念本身依然缺乏想象力,但是齐美尔引入了空间划分理论并概括了空间论题,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的空间想象力。对齐美尔而言,单纯的地理界线(如山脉的地势、河流、海洋等等)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充其量也只是消极的诱因,他真正关心的是心灵划界的空间化,“如果说这种相互划定界线的普遍的概念是取之于空间的界线,那么后者——更为深刻的——只不过是惟一切实的、心灵的划分界线过程的结晶或空间化”(齐美尔,2002:466)。这种关于划界的思想无疑包含着从互动的视角入手探讨建构一种不同于客观物质环境的社会空间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意味着在那个作为物质条件的空间之上,或者说以此为基础,依然可能存在着一种社会性的空间,它蕴含着丰富的观念建构和实践意义。齐美尔指出:“界线不是一个具有社会学后果的空间的事实,而是空间性地形成它自身的一个社会学的事实”(Simmel,1997:143)。这就意味着界线所体现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空间形态不能够还原为单纯的物理环境的效用,它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性。至此,齐美尔在实质上已经与他所坚守的那种机械的物理环境的空间概念拉开了距离,不是对前者加以批判和扬弃,而是在心灵及其互动的社会意义中开拓出一种别样的可能性。

尽管齐美尔已经在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中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但他并没有能够就此开创一种社会本体论的空间视角,而他对空间形式的研究也是十分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社会学早期的开拓者们对于空间的创造性的思考并没有能够被之后的社会学研究者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参阅厄里,2003:511)。事实上,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多数社会学中的空间概念仅仅是那些早期思想家们所共同持有的客观物质环境意义上的空间,并且常常被人们所遗忘。厄里认为,20世纪的大多数社会学是“无时间和空间向度的社会学”,“人们一般是把社会看成内生性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结构既不是时间结构,也不是空间结构”(厄里,2003:505)。在社会学的领域中,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立场在社会学——尤其是20世纪美国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所导致的。尽管有所谓的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保持了对空间的某种兴趣,但是它们显然没有改变主流社会学对空间的态度,它们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也并不具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它们自身在空间理论上少有建树无疑是导致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缺陷看来是它理论上的薄弱，这使它最终衰败下来”（柯林斯、马科夫斯基 2006:297）。

不可否认 在很长时期里以实证主义者为代表的多数社会学家偏爱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 这使他们在根本上对认真地探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不感兴趣。人们热衷于在变化的社会时空中寻找超越时空限制的一般性法则 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寻找普遍的历史规律 而空间区域则往往被普遍主义的空间隐喻所消解 这使得人们根本无法看到他们所迷信的那些所谓的普遍规律本身的时空限制——既是在特定时空中才可能有其或然效用的法则（而不是决定论的法则。决定论仅仅是一种人为简化的产物 [Bachelard, 1984: 104、108]），也是在特定时空中被建构起来的法则。不过即便在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理想占主导的 20 世纪美国社会学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空间理论的存在，它们甚至可能明确影响到了当代理论家的空间思想。如戈夫曼以舞台的类比探讨了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区域化问题（这一研究的某些弱点遭到了吉登斯的批评 [吉登斯, 1998a: 214]，但它对吉登斯的启发也是显而易见的）。戈夫曼使用“前台 (front)”、“后台 (backstage)”、“局外区域 (outside region)”等一系列概念为我们勾勒了一种社会学的空间视角，其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探讨了空间区域的制度化特征与行动者的情境互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探讨了社会结构如何在区域化的空间建构中凭借责任的约束和利益的诱惑来建构起行动者的角色特征 (Goffman, 1959: 251)，并在区域化情境之中的互动各方为维持情境定义所做出的努力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Goffman, 1959: 231 - 232、243、254)。戈夫曼的空间视角贯穿于其综合人格、互动与社会结构的理论尝试，这不单纯是一种对空间的社会学偏好，它已经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空间化的社会学思想。不仅如此，戈夫曼还清醒地意识到，他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空间化图景并非一个普适性的框架 (Goffman, 1959: 244)。事实上，戈夫曼始终保持了对空间差异的敏感，这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社会学家所不具备的。

二、现象学的空间思想

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社会学家更多地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物

理环境不同 在社会学的领域之外形成并主要外在于社会学而发展的现象学思潮对空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一理解为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批判对象。以下我们将针对几种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学空间理论进行一个简要的讨论,它们是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巴什拉的空间思想。

尽管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中明确指出:“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七十节中,我试图把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海德格尔,1999:27);但是也正是在同一文本中,海德格尔又说道:“这种澄明着的将来、曾在和当前的相互达到本身就是前空间的。所以它能够安置空间,也就是说它给出空间”(海德格尔,1999:17)。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时间之优先性的强调主要源自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从空间出发来规定存在的批判(陈嘉映,1995:149、150、152),但这一批判所显示出的对时间的过分偏爱则同样是一个不小的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暗合了索佳所极力批判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对时间性的强调和对空间性的忽视(Soja,1989:130)。^①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我们以下所讨论的正是海德格尔在此书中的空间思想),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论上,作为主体的此在是空间性的,而在世界之内的(within-the-world)空间则只有通过这一空间性才可能得到揭示。但此在的空间性尽管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方式,但这一方式只有奠基于时间性这一基础才是可能的,毕竟对海德格尔而言此在存在的意义即是时间性,时间性构成了此在存在的原始的(primordial)统一状态,此在存在的可能性正是在将来、曾在和当前的整体性的绽出(ecstases)中到其成为可能之时。“空间不是在主体中,世界也不是在空间中。就空间已经由构建此在的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所展开而言,空间倒是‘在’世界‘之中’”(Heidegger,1999/1962:146;海德格

① 索佳将历史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生活和社会理论的过度发展了的历史的情境化,它积极地掩盖和边缘化地理的或空间的想象”(Soja,1989:15。类似的观点还可参阅哈维,2003:256-257)。此种历史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就总体而言社会学家的确更关注时间过程而非空间区域,且不论人们往往忽视了时间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空间课题。但由于在很长时期里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统治了社会学的主流话语,使得社会学的历史主义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这种压制部分地表现为对时间问题的忽视,部分地则表现为名义上强调对时间的研究,实际上将时间架空为流逝着的分分秒秒——如对普遍的历史规律的探究——这在实质上也是对时间的一种剥夺。

尔 2006:129)。这意味着在本质上由时间性来加以规划的世界的意蕴 (significance) 结构是空间性得以可能的基础,“在此在(作为操劳着的‘在之中’)所熟悉的意蕴之中,存在着空间的本质性的共同展开”(Heidegger, 1999/1962: 145; 海德格尔 2006:128)。海德格尔认为,称手之物(the ready-to-hand)的存在即是因缘(involverment),因缘靠指引来联络,这一联络的关系特征即是意指(signifying),而意指的关系总体即是意蕴,后者组建了世界的结构。正是在世界这一关系系统中,规定了此在之空间性的去远(de-severance)和定向(directionality)才得以可能。无论是去远还是定向都是在探讨生活世界之中的熟悉之物(称手的工具)与此在之间的寻视操劳(circumspective concern)的关系,这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距离或确定方位,相反它意在揭示所谓的物理空间仅仅是一个非寻视的理论化的产物(自然空间),此在生存的直接的空間性不是物理的空间性,它所意味着的远近不能用数学的尺度来测量,它所包含的定位也全然不是一个物理方位的问题。对海德格尔而言,事物是远离还是靠近我们,事物处于怎样的场所和位置,这些都是由世界的意蕴关联所指引的寻视操劳来加以确定的(Heidegger, 1999/1962: 142-143; 海德格尔 2006:125、126)。被操劳所及之物总是最为靠近我们的,尽管它在物理意义上可能并不是最靠近我们的。而事物的位置则是在因缘关系的位置整体中由寻视操劳来加以分派的,这完全取决于事物作为工具对于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换句话说,正是在此在所赋予的意义中,某一工具在一个位置的整体中获得了与其他工具之间的位置关系(它的位置只有在这个位置的整体中才能获得理解),从而得以确定它自身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方向之上。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空间首先并不是一个物理的环境,它是以人类主体的存在为中心来加以组建的人与事物之间的前理论的关系状态。

与空间的客观环境论相比,这一空间理论的主观性显而易见。^①它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不感兴趣,转而将视角指向了一种充

① 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环境论对空间的解释便代表着对自然空间形态的绝对把握,事实上,主张空间的物质环境论的社会学家们通常所援引的那种三维物理空间的图景依然是一种人的阐释,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烙印(郑毅 2005:369)。巴什拉指出“对科学而言,真理是对不断出现的错误的历史的纠正,经验是对共同和基本的错觉的纠正”(Bachelard, 1984: 172)。关于物理空间的话语自然也不能例外,任何有关客观的物质空间的描述,无论具有怎样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都不能彻底排除其社会历史性的特征。

满人类主体性的主观的空间,这当然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主观观念中的空间,而是一个具有其自身现实性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如果我们抛开海德格尔的哲学面具,以社会学的方式来理解其此在现象学的空间思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一种社会空间的构想,它与齐美尔有关心灵和界线的观点存在着某种互通的可能性,它甚至与涂尔干有关社会情感对空间进行划分的思想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遥远的呼应,尽管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对立。

现象学尽管由于其主体主义(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不同的现象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不尽相同)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现象学对于主体性的探究的确为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对此,梅洛-庞蒂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空间现象学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现象学主体主义视角之下的空间思维。梅洛-庞蒂主要围绕他的主体间性的或社会性的身体概念来提出其空间理论,他区分了物性的客观身体和统一了客观身体与心灵的现象身体(杨大春 2005:46),后者具有一种超越内在与外在的含混存在,因为现象并非什么“心理事实”,它是一种在身体的知觉中呈现出世界本来面貌的显现,“实在完整地显现出来,实在的存在和显现是一回事,没有不同于显现的实在”(Merleau-Ponty, 2002: 343)。这体现了梅洛-庞蒂试图超越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的努力,但也正是因为他试图将实在的存在与知觉的显现相混淆,才暴露了他对世界加以非法观念化的主体主义的视角(郑震 2009:112),尽管这并不是一个人主义式的主体主义,“每一个他人作为一个不容挑战的共存类型或背景而为我存在,并且我的生命具有一种社会的基调,就如同它具有一种难免一死的特点一样”(Merleau-Ponty, 2002: 424-25)。我们必须结合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思想才能真正地理解梅洛-庞蒂的“现象身体”,对梅洛-庞蒂而言,身体总已经在世界之中存在着,这是它以前意识的不言而喻的方式所熟悉的世界,世界构成了身体的知觉场,身体在其主体间性的运动中展开和维持着它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意义结构。正是在这样一种身体理论的视野下,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是如同容器中的物体一样存在在时间和空间里,身体栖居于时间和空间之中,“我不在空间和时间里,我也不思考空间和时间;我属于它们,我的身体与它们相结合,并且包含着它们”(Merleau-Ponty, 2002: 162)。由于现象身体处于前反思的知觉层面,所有对象化的活动在此

尚未开始,因此对身体而言,空间并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客观的外部环境,后者只是对身体空间采取对象化态度的结果。“成为一个身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就是与某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身体首先不是在空间中:它属于空间”(Merleau-Ponty, 2002: 171)。身体的空间也就是世界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身体的存在展开为它自身的空间性,身体的空间性与身体之为身体具有内在的关联(Merleau-Ponty, 2002: 172)。因此,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在空间中像外部物体那样占据一个位置意义上的空间性,它是一种以前反思的方式加以熟知的处境的空间性,就像一个荒野中的原始人无需思考就能够直接确定方向一样,身体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知晓能力,它将空间包容在自身之中,因为它的存在展开为这一空间的空间性。只要我们记得,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并非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躯体,身体的知觉也并非通过越出其内在性的障碍来体验外部世界,这是一个超越了内外划分的现象身体,在身体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身体拥有关于其空间处境的前概念的系统知识,它不言而喻地领会着世界的意义,这便是梅洛-庞蒂以身体图式(body image)来加以概括的,“最终,身体图式是表明我的身体在世界之中(in-the-world)的一种方式”(Merleau-Ponty, 2002: 115)。

很显然,梅洛-庞蒂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明确地贬低空间性,他并没有将空间和空间性建立在世界的结构之上,没有用时间性来解释空间性或让时间来给出空间,相反身体的空间性正是身体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展开方式,由此身体才成其为一个身体。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梅洛-庞蒂的讨论并不充分,他认为时间是空间的,它是一个现在(present),时间与空间并不彼此排斥,因为原初的空间性正是我们在世界之中在场(presence)的抽象形式(Merleau-Ponty, 2002: 482)。梅洛-庞蒂主要是在身体对世界的感知尤其是对世界之中的物体的感知问题上谈论空间和空间性,相比而言,对时间性的讨论则直接切入到作为其现象学核心的主体概念的建构之中,“这个完全是重新解释和重新铸造的主体性概念,是梅洛-庞蒂对时间和时间性分析的结果”(施皮格伯格, 1995: 775)。这在客观上还是抬高了时间的地位。

与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相比,巴什拉的空间现象学研究在研究的手段和讨论的范围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巴什拉试图通过诗歌中的空间形象来研究空间,他进而将此种形象主要局限于那些区别于“恶意

空间的形象”和“斗争空间的形象”的“幸福空间的形象”。“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所拥有的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巴什拉 2009:引言:23)。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抛于世界”被认为是次要的,因为更为原始的是在幸福之中的存在,这是家宅中的存在,它抵御着家宅之外的那个聚集着他人的敌意和世界的敌意的环境(巴什拉 2009:5-6)。凭借诗歌的文本而不是直接面对现实本身,面对由想象的价值而非实证的价值所主导的幸福的家宅而不是广阔的生活世界,这一切都表明,巴什拉将现象学的主体视角推向了极致,“我们的研究侧重的是内心领域,这是一个心理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巴什拉 2009:11)。在这个内心的空间中,先于行动的想象力占据着主导地位,其现象学的意义就在于:“想象力的现象学不能满足于把形象还原为辅助的表达工具:想象力的现象学要求我们直接体验形象,把形象作为生活中遭遇的事件。当形象是新的,世界就是新的”(巴什拉 2009:49)。这种迷恋于空间的语言编码的现象学研究受到了列斐伏尔的严厉批评,对列斐伏尔而言,重要的是去揭露实际的空间生产,而不是通过研究那些空间的语言编码来创造一种关于空间的话语(Lefebvre, 1991: 16)。而现象学的主体视角则和物理环境论的客体视角一样被以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的当代空间理论的综合取向加以批判和吸收(这一综合取向的具体特征往往也是因人而异的)。列斐伏尔明确指出,其空间理论的目的在于在那些被分别地加以理解的领域间建立起一个理论的统一体,这些领域包括:物理的,如自然、宇宙;心理的,包括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以及社会的(Lefebvre, 1991: 11;此外还可参阅索佳 2006:230-233)。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既不等于心理空间,也不等于物理空间,“我将试图去证明,这种社会空间既不是由一群物体或一种(感觉的)资料的集合所构成,也不是由像一个包裹一样用各种内容加以充满的一个虚空所构成,并且它也无法被还原为一种强加于现象、事物、物理实体的‘形式’”(Lefebvre, 1991: 27)。列斐伏尔批判了社会空间的客观环境论和主观空间论,但他同时也指出,社会空间的最初基础是自然的或物理的空间(Lefebvre, 1991: 402),而且他以“(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产物”的论断既肯定了社会建构的意义也否定了个体还原论的可能性。

三、空间转向

20 世纪的 70 年代,在西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领域中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空间的社会本体论化和空间概念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成为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此前所论述的客观环境的空间概念、现象学的主观空间论以及抑制空间思考的普遍主义、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立场,在这一时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思想的变革固然有其学术领域中的争论和超越的特殊缘由(那些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解释各种问题时日益暴露出的捉襟见肘的窘况,学术反思、争论和创新的内在动力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范围更加广阔的社会世界的发展和变革无疑是导致以上那些传统思维方式受到广泛质疑的一个重要诱因。城市化空间的社会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量(Lefebvre, 1984: 47、135; Soja, 1989: 88、96-97);资本在国内和国外向那些并非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的扩张,在国内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强化,而在国外则是通过不均衡的发展和在地理上“延伸”至世界范围内的较少工业化的区域(Soja, 1989: 88);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的不均衡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所具有的重要性(Soja, 1989: 107;哈维, 2003: 368、370);以及在时空压缩背景下的全球化的同质性和空间的多样化发展(哈维, 2003: 369、370)和所谓的脱嵌(disembedding)与时空伸延影响下的全球性对地方性的拓殖(Giddens, 1990: 108-109)等等,这些不同程度上彼此联系且相互交叉和重叠的现象或多或少地推动着人们将理论的视野聚焦于空间。

在这场空间转向的运动中,列斐伏尔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之一。列斐伏尔认为,20 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化的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的生产已经成为工业生产的目标和意义(Lefebvre, 1984: 195),以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空间的组织在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而支配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存的主要基础(Soja, 1989: 91)。由此,列斐伏尔着手建构起一个空间本体论的社会理论框架,从而与福柯等人一同开启了一场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列斐伏尔空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莫过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空

间的反思和批判,他将这一空间命名为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而他对抽象空间的分析和批判则主要是围绕着他所谓的社会空间的三个要素来展开的,它们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实践属于社会空间的被感知的(perceived)维度,或者说它意味着被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它担负着社会构成物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职能,并且包含着作为任何社会构成物之特征的特定的地点(locations)和空间位置(sets)(Lefebvre, 1991: 33)。对列斐伏尔而言,空间实践是社会空间的物质建构的维度,它是对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尤其是土地和地产所有权的社會构成物(如住宅、商业街区、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等)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既是这一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其结果。在空间实践和社会的空间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Lefebvre, 1991: 38),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藏了这个社会的空间,它既生产社会的空间同时也以之为前提,在分析的意义之上,只有通过对其空间的解码,才能揭示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关于空间表象,它属于社会空间的被构想的(conceived)维度,它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conceptualized space),或者说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空间的表象属于生产关系及其秩序的层面,它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各种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属于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技术统治官僚和社会工程师之类人物的空间。“这是在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中的统治的空间”(Lefebvre, 1991: 38-39)。它体现了统治群体所掌握的知识 and 意识形态的表象化作用及其介入并改变空间构造的实践影响,它无疑是一个表象着统治者的利益和存在的空间,它作为统治的工具主要凭借各种呼唤着统治表象的建筑方案来发挥作用,就如同在国家的技术官僚和专家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城市规划和改造那样。因此,空间表象并不只是意味着抽象的观念,它通过实践的影响而具有客观性,尽管这一客观性由于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相对性而从属于变革的过程(Lefebvre, 1991: 41)。与空间表象不同的是,列斐伏尔给与“表现的空间”某种政治上的而非本体论的优先性(刘怀玉 2006: 416)。它是一种直接经历的(lived)空间,这不是说人们只是在表现的空间中才体验到了空间,而是意味着对批判和反抗空间表象的空间真理的亲身体验,“表现的空间体现了复杂的象征系统,有时是被编码的,有时则没有,这些象征系统与社会生活的暗

中的或反对现存体制的方面相联系,同样也与艺术(它最终更多地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表现的空间的符号,而不是一个空间的符号)相联系”(Lefebvre, 1991: 33)。与空间表象主要偏好于理智上所建构的语言符号系统不同的是,表现的空间更倾向于或多或少一致的各种非语言的象征和符号系统(Lefebvre, 1991: 39)。这是一种想象的和乌托邦的空间,在这个毫无疑问是被支配的空间中,客体倾向于被象征性地使用(Lefebvre, 1991: 39),而这个空间的惟一的产物就是象征的作品(Lefebvre, 1991: 42)。^①

列斐伏尔认为,时间与空间虽然彼此不同,但却不可分割(Lefebvre, 1991: 118、175)。自然空间只是自然时间的手迹(script)(Lefebvre, 1991: 95)。而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时间从社会空间中消失(Lefebvre, 1991: 95),仅仅被记录在像钟表这样的测量工具之上,“经济空间使时间从属于它自身;政治空间将其作为(对权力的)威胁和危险而加以驱逐。经济的并且尤其是政治的首要性暗示了空间对于时间的霸权”(Lefebvre, 1991: 95)。列斐伏尔显然反对时间和空间相

① 列斐伏尔严格区分了“象征(symbol)”、“符号(sign)”和“信号(signal)”。他写道“信号完全运作于它自己的功能发挥中,并且在那里被耗尽;符号(词语)只有当它属于一系列的符号并且在它们的彼此的相互作用中才是有效的”,而象征与符号和信号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似乎是不可穷尽的(Lefebvre, 2002: 284)。列斐伏尔认为,传统的农业社会是由象征系统所控制的,而现代工业社会使信号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后者不断地侵蚀着传统的象征体系,使得语义领域变得越来越简化和统一,以至于“在工业的和技术的社会中,在现代工业中并且因为现代工业,这个领域(指语义领域——引者注)在总体上向着‘信号’一极而被取代”(Lefebvre, 2002: 300)。换句话说,现代工业社会在语义领域中所造成的形式化、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与情感激发、情绪、自发性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系统,甚至将其作为非理性的因素而贬低为无意识的(Lefebvre, 2002: 297、303、334-338)。这一立场构成了列斐伏尔对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的重要组成,对列斐伏尔而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象征体系的瓦解。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试图以技术的方式来激发或取代创造力和自发性,而创造力和自发性来自于与自然和生命的节奏、循环的时间和象征体系密切相连的日常生活,这就导致了工具理性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列斐伏尔认为,人的活动可以分为积累的和非积累的两种主要的过程类型,积累的过程包括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知识、信号、符号等等,它是相对理性的,与空间相关联(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这种观点);而非积累的过程则包括感官知觉、感性、声色、自发性、一般的艺术、主观的或来自于习俗的道德(区别于依靠法律和国家的客观的道德)和与文化相对立的最广泛意义上的文明等等,它是相对非理性的,与时间相关联(Lefebvre, 2002: 334-335)。列斐伏尔正是试图通过这一两分法(不是将它们割裂开来,它们始终是相互作用的),以及包含着不一致、不平衡、差异和冲突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揭示和批判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异化,并进而引发其超越现代社会的构想。列斐伏尔晚年的空间生产理论正是其一生所从事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的一种空间化的发展,其有关抽象空间的理论正是这一发展的关键。

互分离的论调,他同样拒绝对它们进行还原论的讨论,不过,他显然给时间和空间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地位,并且试图从两者的关系中揭示某种社会历史特征,也正是因此,所谓的积累和非积累的过程才分别与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并且两种过程之间永恒的相互作用则暗示了空间和时间之不可分割的关系。换句话说,列斐伏尔赋予了现代社会的空间和时间不同的社会分析和批判的价值,日常生活的异化揭示了现代社会空间的消极意义,而时间则被视为是某种被压制和潜藏的解放潜能的处所(Lefebvre, 1984: 182)。列斐伏尔否定了在一般意义上区分时间和空间何者优越的可能性,但是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空间无疑具有优越性,“日常生活及其话语倾向于被安置在一个空间中,这个空间拥有对时间性的优先权”(Lefebvre, 2005: 71)。^①以至于特定的社会时间只有在空间中并凭借空间才能够被生产和再生产,尽管这个时间具有无法被空间所还原的特征(Lefebvre, 1991: 339)。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区别表明列斐伏尔并没有摆脱西方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二元论调,从而仅仅停留在两种不同现象相互作用甚至相互斗争的视野之中。这也就难怪当列斐伏尔发现了现代社会空间的生产意义和消极特征的时候,并没有在同样的路径中去思考现代社会时间,现代社会时间的生产和统治意义并没有得到清醒的反思(列斐伏尔显然没有意识到其对现代社会空间的分析和批判不可避免地就已经是在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时间),相反列斐伏尔理所当然地将时间建构为批判和超越现代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表现的空间所具有的乌托邦潜能是由时间支配的。总之不是将空间和时间理解为一体的(这不是两种不同现象通过相互作用所构成的那种整体,相反时间和空间正是在

① 列斐伏尔甚至赋予了现代社会空间以一种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刘怀玉 2006:408)。关于这一本体论的内涵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既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前提,也是其结果;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固有地存在于财产关系中(尤其是关于土地和地产的所有权),并且与生产力(它将一种形式强加于那个土地或地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它是被使用的产品,被消费的产品,它也是一种生产的手段;交换的网络和原材料与能量的流塑造了空间,同时也被它所决定(Lefebvre, 1991: 85)。可以说列斐伏尔所说的“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产物”的论断并不意味着社会空间仅仅是一种社会基础所派生的现象,相反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将现代社会空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他承认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了社会空间(Lefebvre, 1991: 210),但他同时也指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在生产力的发挥中发挥作用(Lefebvre, 1991: 349),对于列斐伏尔而言,空间的生产对工业化乃至资本主义的生存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Soja, 1989: 91),它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发挥以及维持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现实的经验中人为抽象出来的分析的维度——我们将在最后一节进一步地讨论这一问题），并始终在此种一体的意义上探究解放的可能性，而是在二元论的逻辑下，戏剧性地将时间和空间在相互作用中对立起来，所以当空间获得压迫的霸权时，时间就成为了解放的主导，尽管其中的理由只是列斐伏尔的一厢情愿。

在讨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现的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列斐伏尔指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它们是否构成了一个一致的整体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时，列斐伏尔却提出了一种悲观的论调，不仅空间的实践被空间的表象所支配，从而沦为其思想的非思，而且对于统治秩序具有颠覆性的表现的空间也消失在空间的表象之中，后者吞噬了前者（Lefebvre, 1991: 398）。这一点与抽象空间的基本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抽象空间是权力的空间（Lefebvre, 1991: 51），一方面，任何新的国家和政治权力都会以它自身的方式去分割空间，并提供它自己关于空间以及空间中的事物和人民的话语（Lefebvre, 1991: 281）；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空间和空间生产的概念，权力的框架就不可能获得具体性（Lefebvre, 1991: 281）。由此可见，抽象空间并不外在于权力，空间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权力的生产，抽象空间作为国家统治的空间具有工具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构成了福柯对现代空间的一种理解，只不过福柯的具体思路与列斐伏尔有一定差异），它是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的工具（Lefebvre, 1991: 289、371、391），因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抽象空间固有地就具有它自身所特有的主导权力（或者说暴力），这一中心化的权力总是试图将异己的权力加以消除（Lefebvre, 1991: 281），它要求成为总体的权力，其运作显然是暴力化的，尽管这一暴力的特征往往掩盖在一种关于统一的合理性外衣之下。事实上，抽象空间的总体性要求正是通过宣称一种政治的合理性来实施的，后者依赖于技术专家阶层的表象化建构。抽象空间的空间表象建构了一种总体化的意识形态，它试图消除表现的空间所具有的异己力量，并且将空间的实践纳入到自身的客观化之中。然而，列斐伏尔并没有在他的悲观论调中彻底丧失希望，事实上，他始终坚信，抽象空间通过对空间的分化和整合所制造的同一性仅仅是一个幻觉（Lefebvre, 1991: 285、287、308）。这一幻觉依赖于抽象空间以各种意识形态的符号表象来替代真实（用自我的形象来取代自我本身，用女性的形象

来取代女性本身,用性的形象来取代性本身等等,这是一种符号的异化统治)它总是试图以意识形态的抽象化的精神表象来掩盖或否认它的实际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以至于“在知觉领域中的关系并不反映社会关系本身——相反,它们掩饰后者。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在感觉的一肉体的(或实践和知觉的)空间中是不可见的”(Lefebvre, 1991: 211)。这也就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空间实践对社会空间的隐藏作用,只有通过对社会空间这种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解码,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一种空间实践。

列斐伏尔认为在抽象空间的同一性表象之下包含着矛盾(Lefebvre, 1991: 52),今天阶级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铭刻在空间之中,并阻止着抽象空间的总体化进程(Lefebvre, 1991: 55)。列斐伏尔既没有试图用空间的矛盾来消解或吸收资本主义的历史矛盾(即空间中的矛盾),也没有试图用空间的生产来取代空间中的物的生产,在他看来空间的矛盾和空间的生产只是包含、预设、扩展、提升和放大了历史的矛盾和物的生产所提出的问题(Lefebvre, 1991: 334)。在此前提下,列斐伏尔以一种尼采式的身体视角来诠释他的革命理想(刘怀玉 2006:410),这意味着列斐伏尔的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理论的身体转向在论域上发生了交叉,不过与同样受到尼采影响的身体理论家福柯不同的是,列斐伏尔对尼采的解读显然要积极得多(但也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列斐伏尔陷入了一种缺乏经验论证的乌托邦幻想之中,这与福柯同样缺乏经验论证的过分悲观的论调恰成对照)。在列斐伏尔看来,身体固有的就是空间性的,而空间的生产也不能没有身体的行动这个必要的条件,身体生产和再生产了空间(Lefebvre, 1991: 40、174、199-200、216)。列斐伏尔认为,尽管面对着抽象空间的压制、剥夺、吸收、蔑视乃至忽视,而身体也的确可能在抽象空间的意识形态统治下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但身体依然具有一种不可彻底还原的反抗性,它为我们揭示了差异的可能性,另一种空间的可能性。当列斐伏尔沉醉于尼采的酒神精神幻想着身体欲望的造反时(刘怀玉 2006:33),另一位推动空间转向的社会理论家福柯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与身体的论域中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福柯彻底否定了现代身体的积极内涵:身体的欲望也只能是权力—知识所建构的消极产物。

正如索佳所指出的,列斐伏尔与福柯构成了当代空间转向的两位

重要的代表人物(索佳 2006:232 - 233),我们对当代空间思想的研究也将主要围绕他们两人展开。不过福柯并没有像列斐伏尔那样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作为一个专门论题来加以广泛讨论,福柯仅仅将视角集中于现代空间中的权力—知识与身体和主体性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统治所具有的意义。除此之外,“跟列斐伏尔不同的是,福柯从未以具体或系统的方法来清楚地将空间性加以理论化,此外他也不承认空间是他的哲学论述与政治学的核心,这点与列斐伏尔也正好相反”(索佳 2006:233)。这就意味着,福柯的空间思想只是隐含于他对现代身体或者说现代主体性的研究之中,空间是他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维度,但却不是他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本身——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含混和不足。

福柯对于现代身体的解释和批判基本是在一个以空间为主导框架的视域中进行的(相对于时间而言),尽管对福柯来说建构身体的是权力—知识这一关系体,但是对福柯而言,权力与知识正是在空间中联系在一起,不能外在于空间去想象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及其运作,换句话说,权力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生产知识并通过知识去发挥效能,正是通过建构起一个特定的空间,权力和知识才可能作为一个关系的整体去建构身体(我们暂且将时间的问题置入括号)。虽然福柯赋予他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关系权力以一种相对于知识的逻辑上的优先性,但是权力只有通过生产知识并在知识的实践运用中才能够存在并发挥其支配性的作用,而这一过程不可能外在于各种空间的安排,“一旦知识可以通过区域、领域、置入、移置、易位来加以分析,人们就可以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发挥作用并撒播权力的影响的过程”(Foucault, 1980: 69)。也就是说,福柯是以一种明确的空间视角来铺陈其权力—知识建构身体的叙事的,权力—知识只有通过各种空间的安排才可能发挥其支配的作用。不过当福柯谈论身体的建构时,空间主要被描绘为权力的工具,它甚至是由权力所创造和组织的,“在组织‘单人室’、‘场所’和‘等级’的时候,纪律创造了复杂的空间,它们同时是建筑的、功能的和等级制的。正是空间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并允许流动;它们开辟出个别的部分并建立起操作性的联系;它们标记场所并指出价值;它们确保个体的服从,还确保对时间和姿势的更加节约的使用。它们是混合的空间:既是实在的,因为它们控制着建筑物、房间、家具的安排,也是观念的,因为它们是对特征描述、估价、等级制度的安排的具体

化”(Foucault, 1977: 148)。福柯将实在和观念加以混合的做法显然是要克服物质环境论和主观空间论之间的冲突,空间是物质和观念的混合体,尽管这一混合体由于福柯的客体主义立场而彻底否定了现代主体的能动性(郑震, 2009: 148),以至于它的观念性仅仅是建构身体或主体性的客体性的力量。福柯丝毫也没有掩饰在空间的构造中权力所显示的支配性,是权力安排和创造了空间,这一过程体现了权力所生产的知识在物质环境中的具体化(从建构身体的角度而言就是规范化),也只有这样权力才能够发挥其建构和控制身体的支配作用。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混合的空间所提供的区域化的定位或分隔(Foucault, 1977: 143),实则体现了特定权力的战略,空间是权力的战略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工具,权力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作为权力来发挥作用。

至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与权力—知识之运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混合了物理和观念维度的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空间),它既是权力的运作所建构的工具,也是这一运作得以可能的条件。因此,权力在本体论上并不外在于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空间性(一种混合了物理性和观念性的空间性)构成了权力的本体论维度,这一维度的本体论意义不仅仅在于权力总已经是特定空间安排之中的权力,权力总是以某种具体的空间姿态而到场,^①它同时还意味着特定的权力总有其特定的空间性,福柯所描绘的建构现代身体的纪律权力正是在全景展示主义的空间中到场(而这一空间也正因为这一到场才成其为这一空间,它们实质上是一体的),空间不是绝对的,特定的权力总有其特定的空间。对于福柯而言,边沁所描绘的全景式监狱是纪律权力的空间的原型。福柯并没有提出一个与之相称的时间原型(“时间表”固然是一种古老且极其重要的时间技术,但它并没有获得全景式监狱所具有的那种象征意义),事实上,时间更多地体现为在空间之中展开的程序

① 权力对空间的安排和创造本身就是权力在场的一种本体论方式,权力不可能不以创造某种空间的方式而存在。我们不能将福柯所展现的工具论的空间思想理解为空间仅仅是权力所使用的一个外部工具,工具性的特征意味着空间不是一个机械的外部环境,而是具有社会历史意义或价值的社会存在。此外我们的确无法想象在福柯那里会有一种在本体论上先于空间而存在的权力——这种权力理论意味着福柯所厌恶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取向,我们只能设想特定的权力外在于特定的空间或进入特定的空间,就像纪律技术越出修道院的围墙而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和扩散所表明的那样,在福柯的语境中这意味着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斗争和此消彼长的关系问题。

和表格,它暗示了空间的技术必须是有耐心的、分成序列的、过程性的、不断积累的、周期性的、富有节奏的、目标定向的甚至是进化的。对于福柯而言,时间当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它与空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甚至同样是权力的本体论维度,没有外在于时间的权力,任何权力及其合理性都是历史性的(福柯,1999:164)。^①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影响福柯对空间的某种偏好,这也许是出于对索佳所说的那种历史主义的矫枉过正,也许是现实本身影响了福柯的判断(索佳,2006:228-29)——尽管这只能是一个误判(我们将在最后一节阐明这一问题)。在福柯的思想中,空间性虽然不能取代时间性而独揽权力的本体论性质,但是福柯有关现代身体的论述的确是空间主导的,当他宣称,“全景展示的方案,无需作为此种形式而消失或失去它的任何特性,注定了要延伸到整个社会;它的天职就是成为一种一般化的功能”的时候(Foucault,1977:207),福柯已经将边沁所构想的全景式监狱视为现代社会的原型,这一诠释的空间导向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时间并没有被排除在外。

全景式监狱给予福柯空间思想的最大启发就在于,在一种可见和不可见的空间关系中,纪律权力得以通过时间的耐心使个体从权宜的服从转变为自我的约束,这种内在化确保了对肉体的最高效能的征服。“纪律权力通过其不可见性被实施;同时它强加给那些从属于它的人一种强迫的可见性原则。在训练的过程中,从属者们必须被看见。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施加于他们的权力对他们的控制。正是始终被看见和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被看见这一事实,确保了被训练的个体处于从属的地位”(Foucault,1977:187)。看与被看、可见与不可见,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它是空间的差异和不对称所包含的力量关系。福柯为我们描绘了现代社会中通过警察组织、工厂、学校、监狱等机构所编织起来的持续的、分层的、区域化的监视和记录的系统,“那里不需要军队、有形的暴力、物质的约束,仅仅是一种凝视,一种检查的凝

^① 福柯分析了纪律权力的生成和发展,并且预言始终存在着对之加以超越的可能性(Foucault,1997:167)。这一超越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它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权力关系。权力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体现了福柯的相对主义倾向,这无疑拒斥了那种普遍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要求,不是寻找普遍的权力法则,因为任何权力都是时空性的,不可能具有超越时空的绝对客观的认识,因为外在于权力来谈论知识只能“是在乌托邦的幌子下对人道主义的一种复活”(Foucault,1980:52),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向我们揭示一切知识都有其特定的时空性。

视,每一个人在它的重力之下将通过内化而成为其自身的监工,于是每一个人都使用这一监视来对付并反对他自身”(Foucault, 1980: 155)。监视的技术无疑是一种空间技术,空间的不对称使得监视得以可能,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时间的技术,因为如果没有时间的耐心和积累,监视就无法进行并将规范化转化为肉体的建构,从而使一种强加的主体性转化为一种个体的自我认同——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建构。正是持续的监视和反复进行的规范化的训练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易于控制且极具效能的个体乃至群体。

福柯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列斐伏尔在身体的空间建构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所存在的不足,但是福柯的现代身体理论显然受到其客体主义立场的干扰而过于消极,虽然不能将福柯等同于传统的结构主义者,但是福柯显然与结构主义分享着共同的客体主义立场,以至于福柯完全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福柯后期思想的转变不属于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他的空间维度显然具有一种建构身体的客体式存在,尽管这并不只是一种物理存在。与福柯不同的是,列斐伏尔对主观的空间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从我们前文讨论过的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三要素的划分和研究就能够清楚地看出来。列斐伏尔明确地指出:社会空间是过去行动的产物(承载着特定的空间观念的过去的空间实践建构了社会空间)它也允许新的行动产生,它一方面促成一些行动,另一方面则禁止另一些行动(Lefebvre, 1991: 73)。列斐伏尔反对将社会空间与创造性的活动对立起来,仿佛社会空间仅仅是一个物体(thing),在他看来“社会空间本身同时是作品(work)和产品(product)——一种‘社会存在’的物化”(Lefebvre, 1991: 101 - 102)。然而尽管如此,列斐伏尔却不适当地强调一切空间总是已经先于在它之中显现的集体或个体的行动者而存在,这一空间的在前的存在调节着主体的在场、行动、话语和能力等等(Lefebvre, 1991: 57),虽然列斐伏尔同时指出,人们虽然以特定空间为前提,但也可以否定这个空间(Lefebvre, 1991: 57),但是列斐伏尔的论调还是突出了作为社会产物的社会空间相对于主体的某种优先性,这不能不说是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某种较为温和的残余。

虽然我们并没有在前文讨论布迪厄、吉登斯、哈维、索佳和卡斯特等人的空间思想,但这是因为我们此处的目的仅在于系统地阐明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空间转向的核心的和主导的特征及其意义,我们对

于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研究已经足以揭示,在一种将空间概念社会本体论化的倾向下,当代空间转向呈现出反历史主义、反客观主义、反普遍主义以及综合客观环境论和主观空间论的基本特征。这一转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今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基本面貌,批判和超越了传统主流社会学在实质上忽视空间的状况,使空间成为一个核心的社会学范畴,使对于社会空间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的重要方面。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空间转向对从空间的视角来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研究和批判;福柯用全景式监狱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型,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的生产和压制等等。事实上,当代空间思想对空间的工具论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空间的社会统治甚至社会压迫意义的探讨,抽象空间的异化和压迫,以及纪律社会的生产性的压抑(Foucault, 1980: 108)无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我们不能总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统治,空间的工具性也可能有其相对积极的一面,如吉登斯在对“行政力量”(吉登斯将其定义为控制人类活动的的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以及生产行政力量的“权力容器”(即通过将资源在其中调集起来从而生产或再生产出支配力量的场所)的研究中试图表明,尽管现代监控包含着压制性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是各种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监控的密集化,是现代社会的整个体系及整个世界中组织发展的基础,也是迈向民主参与的趋势和压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吉登斯, 1998b:365)。不过虽然吉登斯批评福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的看法过于消极(Giddens, 1981: 172),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并不能够消除监控的压迫性(吉登斯, 1998b:361),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无论存在着怎样的观点上的一致或差异,总之这些工作不约而同地推动了以空间为视角的批判理论的发展,空间的合理性和正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①

① 例如哈维有关空间和社会正义的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反对所谓的正义和合理性的普遍概念,认为正义和合理性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和个人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哈维, 2006a:212)。他进而将其乌托邦思想与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了一起,“如果空间和时间被当作社会构造(暗示着否认了牛顿和笛卡尔所创立的绝对时空理论),那么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的生产”(哈维, 2006b:177)。

四、结束语：展望一个概念的重构

尽管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具有诸多积极的方面,但是正如我们的研究已经部分表明的,在理论的方法论层面,它的许多理论家还依然不同程度地困扰于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思路。虽然像哈维和卡斯特这样的空间理论家与列斐伏尔一样强调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空间(哈维,2003:254、255;卡斯特,2001:505),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解决空间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论的明晰方案。另一方面,在对待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问题上,当代空间转向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二元论调。卡斯特明确宣称,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卡斯特:2001:466)。而他所谓的“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这一定义也只是将空间理解为一种同时性的状态(卡斯特:2001:505)。

由此可见,当代空间转向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其社会解释和批判的效力。无法彻底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困扰使之面临着简化主义的还原论或人为地分裂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风险。而将时间和空间加以联系性地地区分的做法则使人们很容易陷入到时间和空间何者优先或具有决定性地位之类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中去。这些独断的观点所造成的混乱远远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使得建构一种超越主客体二元论和时空二元论的空间概念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我们只想对建构空间概念的思路提出一些展望,它们也许能够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建设性的框架。当代空间转向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空间的社会本体论意义,我们进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非像列斐伏尔那样仅仅在再生产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来谈论社会空间的本体论地位,我们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对空间的社会本体论意义的理解也就不同于列斐伏尔),这一本体论意义应当意味着任何社会行动都是空间性的行动,都有其具体的场所(场所是以物理环境为基础的社会性空间现象),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空间的构造。对我们来说,空间的社会本体论意义就在于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一种空间性的在场,其存在的意义中都已经固有地包含了一种空间性的经验内涵。在分析的意义之上这就意味着行动总是或多或少地以场所为定向,不仅不同类型的行动会在不同类型的场所中展现,而且同一类型的行动往往会由于场所的变化而显示出不同的面

貌,而从分析的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就意味着正是各种行动的空间性到场所建构起了场所的情境性特征或场所的空间结构(也就是场所的社会结构,我们暂且搁置了时间问题)。到此我们已经为超越空间的主客体二元论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方案,这就是在分析上人为地区分行动者及其行动的空间性和空间的结构,我们可以将这种空间性理解为一种关系性(郑震,2005:377),社会空间就其根本而言即是人与人、人与事物(包括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其分析上的结构形态即是一种关系结构,而在行动者的内在性的分析层面则显示为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如果我们超越这一分析上的二元状态,我们将看到在现实之中所存在着的是关系性的社会行动(一切社会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行动主体与他人或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分析性的层面正是在社会行动中人为抽象的结果。如果我们以分析的口吻来描述社会行动的过程,它就意味着行动者们的空间性通过其行动生产和再生产着空间的关系结构,与此同时空间的关系结构则生成和制约着行动者们的空间性的行动,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在本体论上是共属一体的。

我们在展望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时并没有提及时间,然而时间总已经在我们的讨论中在场,因为空间的关系性总已经是一种时间性。如果我们将时间性理解为是行动的可能性(郑震,2005:375),它意味着我们在将来可能如何行动,那么空间的关系性就只能是可能的关系性,因为一切关系性都是行动的关系性,可能如何行动就意味着可能以何种关系而行动。这样时间性和空间性就成为我们理解行动的两个分析的面向,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的分析名称,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才保留了这样的划分,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关系性也就是可能性,反之亦然。因此,在实际行动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关系性和可能性的两分状态。由此可见,行动的空间性始终是可能的空间性即时间的空间性;反之,行动的时间性始终是关系的时间性即空间的时间性。只要我们抛开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人为划分的分析提法,时间性和空间性实则一体于行动之中,这便是行动的时空性。从主客体划分的角度来说,与行动者的时空性在分析上相对应的是社会的时空结构(或者说时空性的结构形态,也就是社会结构本身。这一分析性论断与“行动者的时空性就是行动者的内在性构成”这一分析性论断一同显示了时空的社会本体论意义)。这种分析的口吻意味着,在行动者的内在性层面有着关系的可能性或可能的关系性,而在社会结构的外在性层面则有着

可能的关系结构或关系的可能结构,因此,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既是行动者们在采取行动也是时空的结构在建构行动,然而只要我们打破分析的理论抽象去面对现实本身,那么既没有内在的时空性也没有外在的时空结构,有的只是超越了“内”“外”之人为划分的现实的社会行动本身(郑震 2009:231)。因此,社会时空就其现实状态而言超越了主客体二元论和时空二元论。

参考文献:

- 巴什拉 加斯东 2009,《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陈嘉映 1995,《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
- 厄里 J. 2003,《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载布赖恩·特纳主编《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福柯 米歇尔 1999,《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海德格尔 马丁 1999,《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6,《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 哈维 戴维 2003,《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6a,《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朱康译,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6b,《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吉登斯 安东尼 1998a,《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 1998b,《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
- 柯林斯 兰德尔·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2006,《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北京:中华书局。
- 卡斯特 曼纽尔 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怀玉 2006,《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马克思 卡尔 1995,《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前半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8,《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后半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齐美尔 盖奥尔格 2002,《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施皮格伯格 赫伯特 1995,《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索佳 爱德华 2006,《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主义批判》,王志弘等译,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涂尔干 爱弥尔 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大春 2005,《杨大春讲梅洛-庞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郑震 2005,《论身体时空》,《社会理论学报》(香港)秋季卷。
- 2009,《身体图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Bachelard ,G. 1984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Boston: Beacon Press.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blish :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1980 ,*Power/knowledge*. Colin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97, “Sex , Power , and the Politics Identity.” In Paul Rabinow (ed.) , *Michel Foucault* (vol. 1) : *Ethic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 *Power ,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Heidegger ,M. 1999/1962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SCM Press Lt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影印本)
- Lefebvre ,H.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 Oxford ,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Trans.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2005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3) :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Merleau-Ponty ,M. 200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immel ,G. 1997, “The Sociology of Space.” Trans. by Mark Ritter & David Frisby. In David Frisby & Mike Featherstone (eds.) , *Simmel on Cultur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 Soja ,E.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杨 可

shaping personality with *qi* , and the last is advocating chivalry by *qi*.

Zero-inflated Poisson/Negative Binomial Modeling for Sociologis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duced abortion in China
..... *Wang Cuntong* 130

Abstract: This study introduced Zero-inflated Poisson/Negative Binomial modeling (ZIP/ZINB) technique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s. Hoping to help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feel comfortable to use these analytical tools , the author took an example about induced abortion in China to demonstrate major concepts , analytical strategies , and advantages of ZIP/ZINB modeling technique by comparing the analytical results of ZIP/ZINB with the Poisson/NB results.

The Changes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 *Zhuge Weidong* 149

Abstract: The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 which grew out of associations and publications , is a mechanism of social introspection. The way it affects the society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establishmen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bears an internal connection to Japan 's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 , in bo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 , it has gone from Modernism , Marxism , Anti-Modernism , to a mass-based perspective on histories and social historie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by tracing the historical use of terminologies like "the people" ,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citizen" , thereby argues for a specific approach to analyze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Space: A concept of sociology *Zheng Zhen* 167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ociology , and lays open the sources of thought ,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the turn of spac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ology. This turn 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space as a social ontological concept , absorbed and transcended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theories of space. It criticized objectivism , universalism and historicism. But its perspectives of space tangled with Cartesian dualism in different degrees , and have been limited by the dualism of time and space. Hereby the author forecast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ace.